

李枫校友访谈（1971级）

受访者 197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75年至1977年，赴摩洛哥留学。1977年至1985年，任教于北外法语系。1985年至1990年，任教于北外译训部。1990年赴法国，并取得巴黎第三大学翻译学博士学位。1991年成为AIC会员。1990年至今为自由职业口译员，服务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及法国外交部等政府部门、企业。

采访者 梁莉

能否请您谈一下在北外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在北外的经历给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是北外“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1971年入校，在北外当时学校所在地湖北学习一年，后来到北京学习3年半。我和北外渊源很深，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北外附校的，1964年进入北外附中，1990年离开北外，其间除了两年插队，两年留学，都没有离开北外，和北外感情很深，对北外和法语系都很关注。对北外印象比较深的是，感觉北外学习风气非常好，因为在山西经历过插队之后，觉得学习的机会不容易，十分珍惜，而法语系给我们创造的条件也特别好，专门成立了一个附中班，只有6个人，而且学校给我们配备了一个特别强的师资队伍，包括我的恩师金国芬、郭迪成、罗慎仪、沈大力等先生，3年半的学习都是由这几个老师负责的。不仅是附中班，北外的师资力量普遍都很强，有一大批本身法语底子和教学都非常好的老师，形成了从法语专业来说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强的师资力量。而当时在北外打下的基础和底子对后来的工作，不管是在北外或其他地方的教学，甚至是后来的专职翻译，都可以说是终身受益的。

可否请您谈谈您是如何成为联合国认证译员、AIIC（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会员的？您在教科文组织工作近40年，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这份工作？

从联合国会议译员、AIIC会员，一直到教科文组织，从1978年第一次在教科文组织做会，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我觉得当时也是学校的一种考虑，在北外上学的时候，附中班口语方面相对来说强一些，我留校以后，系里专门对我在口译方面进行了培养，提供了很多机会，对此我也非常感谢法语系。比如当时留校以后我一边上学，一边陪当时在校的专家，给他们做翻译；另外，当时学校和友谊宾馆（所有外国专家都住在友谊宾馆里）建立了联系，友谊宾馆每周有一次给外国专家放中国电影，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宣传，每一次的电影都是由北外的老师去活动现场给他们做同传翻译，但当时我没有学过同传，而翻译电影，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同传的一个最初的启蒙教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地习惯了同传的工作方式。后来是在1985年的时候，北外的译训部和联合国初步谈好要开办法语的联合国译员培训，我就被调到了译训部，帮助筹备法语的培

训，1986年开始，译训部开始正式招收法语学生，一共招收了两届，每一届两个学生，培养了4名联合国译员，有3人通过了联合国的考试，目前为止也都在联合国系统担任同声传译。实际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和联合国系统的翻译以及同声传译结下了缘，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从事同传工作。在1985年调到译训部以后，一直到1990年离开北外，我都一直在译训部教书。关于成为AIIC成员，我1979年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会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协会。当时我没有经过同声传译的专门培训，也是第一次进同传箱做口译。不过那时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我将来一定要成为AIIC的成员。那个时候还只是一个想法，未敢真正提出申请，后来真正进到AIIC是大概1991年的时候。1990年到了法国以后，因为此前已经有多次在教科文组织做会的经历，所以我的名字已经登入联合国系统的翻译名册，所以1991年的时候提出加入AIIC就顺理成章了。其实加入AIIC的条件也是很清晰的，一是要有两百个小时以上正式进同传箱翻译的经历，同时要有5个介绍人，其中3个必须是自己同箱子的同事（对我来说就是中文箱子的同事），还有一个是b语言（对我来说就是法语）的同事作为推荐人，最后就是你做出来的翻译真正使用的对象，即英文箱子的翻译同事做推荐人，所以在1991年加入了AIIC，也是国内第一批进入AIIC协会的成员。

您曾说“把如履薄冰作为自己的工作常态”，那么“如履薄冰”具体是指什么？能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什么有益之处呢？

我当时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如履薄冰”应当作为自己的工作常态，尤其是年龄越大、做同传的时间越长，这种感觉就越突出。因为翻译工作，尤其是口译，很难保证每一次都做到百分百的自己满意、客户满意。在工作之前，做充分的准备，并拿出了自己百分百的能力去做，但是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很难去预判，所以我觉得“如履薄冰”是对工作的一种敬畏，也是对工作的谨慎，作为翻译来说就是要特别认真地对待工作。另外，“如履薄冰”这个概念随着年龄、经历的变化，也不太一样，像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基本上什么工作都敢接，而同样的工作，我们就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把握和自信，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是对工作的一种敬畏，因为经历的多，遇到的情况也多，因此也给我们一些提醒，翻译一定要保持严谨，不要把话说满，也不要过高估计自己。但是我觉得对“如履薄冰”也不要产生误解——即小心翼翼的，很缺乏自信。我认为“如履薄冰”

和缺乏自信不是一个概念，“如履薄冰”并不意味着没有自信。在教书过程中我一直和大家说艺高人胆大，这其中也存在一个辩证的关系，“胆大人艺高”，比如我在课堂上要求学生，首先声音要洪亮，做派要非常镇定自如，即使你内心非常紧张。否则就算自己翻译得还不错，但如果因缺乏自信，翻译的时候不敢跟客户有眼神交流，那么客户会对你的翻译产生怀疑。再者，“如履薄冰”也说明了翻译的一个特性，就是它的挑战是在不断变化的，每一次翻译、每一次任务的变数非常大。翻译是一种被动性的交流，并不是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说话人要说什么，我们就要替他表达什么。我记得在写论文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一个外国的研究人员写到关于翻译参与语言交流，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你好像是在门口，隔着门缝听到什么东西，然后翻译出去。意思是你并不是直接交流的参与者，你只不过要把直接参与交流的双方的想法、想说的话，通过自己的工作语言翻译出来。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如履薄冰”也是翻译人员应当践行的。

您曾陪同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以及多位外长访华，并参与了法国政府接待我国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参与这些重要的翻译活动您是如何进行准备的？

这些确实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挑战，在法国外交部，是没有专门的中文科或者翻译室之类的，这种时候，他们就会查找外交部认证的翻译名单，按照过去合作的经历来分配这些工作。在参与这些工作之前，从准备方面来说，我们在国外作为对方的外交部或政府部门工作的翻译人员所能够接触到的资料以及所能做的事先准备，可能不如国内外交部的翻译人员多。在北外教书的时候，我也曾陪同一些部长级领导进行翻译，或者借调到外交部，当时并没有那么深的感觉，因为我们是把翻译当成自己人。但是后来工作时，有一次王毅部长到法国和法方总理法比尤斯会谈，当时是一张长桌子，中方翻译就坐在王毅旁边，而且中方翻译手里有和王毅一样的案文（即要讨论的东西），而我当时手里面什么也没有，并坐在法比尤斯后面，特别深刻地感觉到在国内做翻译和在国外做翻译真的不一样，面临的挑战不一样。这些我觉得都是很有益的一些经历，虽然难度增加了，但对自己的锻炼也更大了。像为这些重大活动做准备，要主动地去要求对方提供文件、发言稿，外方很难提前很长时间把发言稿给你，但是作为翻译有机会就要通过一定的渠道去要稿子，催多了以后对方（礼宾或者总统秘书）也会主动地去帮你，当然我们更要依靠自己去查资料。中方和外方有很大的一个区别，中方领导

的讲话稿会很早提供给翻译，使其充分准备，而外方发言稿不会提前提供，比如希拉克要去清华大学做演讲，稿子是在演讲前半个小时礼宾司提供给翻译的，我只有很少的时间看演讲稿。所以对于翻译来说，完成一个翻译任务，最关键的准备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长期的积累和储备。从第一天做翻译起，就应该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数据库，按照翻译类别，从词汇、背景资料的角度等，分门别类，这样可以随时从自己的数据库里寻找相关资料。你要知道在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去哪里找答案，这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可以和同事交流沟通进行准备。

您曾多次在采访中提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那么您在实际工作中是如何践行这一原则的呢？能否举例说明？

“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个原则我觉得很重要，一个人在做人的过程中时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作为翻译来说，翻译人员是服务人员，翻译本身是一个服务的行业，有些人会说既然是服务人员，就应该做到有求必应，怎么还会涉及有所为有所不为呢？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艺术是没有国界的，但是艺术家有国界”，作为翻译来说也是如此，翻译这个行当是没有界限的，从原则上来说是什么样的翻译都应该做，但是作为翻译的个体来说，我还是会有所选择的，当然这种选择的余地不大，我碰到的也不多。我们大脑里要永远有一个底线，有一个最低限度。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说，从翻译质量来说，作为自由职业者，做一份工作才能挣一份钱，所以可能很少会拒绝工作，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非常清楚，哪些领域是你能够胜任的，哪些领域涉及的知识是超出你个人的知识储备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考虑是否接下这份工作，该说不的时候就要敢于说不。另一方面，涉及职业道德。“有所为，有所不为”，涉及基础层面的译员的能力不是无限的，另外，从职业道德来说，也是有底线的。

在AI技术迅猛发展的今日，您对外语学科的未来发展怎么看？您对法语学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人工智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也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对翻译这个领域来说，有人说人工智能有朝一日会取代翻译。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一直认为北外的传统，不管是法语系，还是

英语系或是其他的系，一个优势就是语言本身。任何一门外语，从语言的基础、实际应用能力，尤其是口头交流能力，北外可以说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另外法语系现在已经变成了法语语言文化学院，那么就要加大文化方面的内容，文化是语言的基础，外延的对象，应该加强文化方面的培养。目前，因为离开北外时间较长了，很难就北外发表看法，可以以局外人的眼光来说一说，因为虽然这么长时间没有在北外，但是我一直没有脱离教学，在巴黎的两个高等翻译学院以及上外，每年都会参加法语教学。对于国内的法语学习，我也观察到一些不足，第一就是语言的基本功，和过去相比差了；第二就是表达能力的局限性也比较大，从语言表达的手段、词汇、句型、语感等等，中文式的表达比较突出。针对这些不足，人工智能可以提供一些改变传统学习的模式和方法，尤其我觉得，既然是中国式的表达比较多，学生仅靠学校的学习，法语的语感是比较差的，那么就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信息量，它涉及的范围、传播速度以及跨空间跨时间的这些特点，通过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来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语言环境，来改善他们的语感和知识结构。

寄语

我希望法语学院能够继承传统。法语学院有一些好的传统，不管是从语言的功底，还是从语言基础的扎实程度和学习过后的能力，北外的法语学院在全国是位于前列的，希望法语学院能继承好的传统，把北外的优势发扬下去。同时我觉得北外也应该加强和其他学校交流和合作的力度，近年通过在上外教书，我和其他的外语院校如广外、川外等也有所接触，参加过一些交流会等，有时候感到很遗憾的是在这些场合北外的声音并不是很大。但事实上，北外应该是一面旗帜，它有这个能力，有长期以来积累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优势是很明显的。希望今后北外能够进一步加强和国内其他院校的交流，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